

香港教育去殖民化的若干思考

殖民主义对香港教育产生深重影响

英国对香港156年的殖民统治以及英美新殖民主义对香港教育产生了深重影响,概而言之体现在“文化惯性”“制度惯性”“政策惯性”三方面。

“重英轻中”的“文化惯性”,抬高英语教育和西方价值观,贬低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殖民时期的香港教育本质上是“三轨制”,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一轨是面向英国子弟的英文小学—英文中学—英国剑桥本土大学,从而造就英国统治香港的代理人;第二轨是面向上层华人子弟的私塾—8年制英文中学—香港大学,培养“对英国、香港、中国内地有影响力的亲英势力”;第三轨是面向普通华人子弟的中文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劳动大众。第一轨等级最高、最具特权,第二轨次之,第三轨再次之。这种泾渭分明、等级森严的“三轨”制教育造就了香港重视英语和西方文化、轻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普遍社会心态,想入非非地就必学习西方文化而成为香港华人家长的普遍选择。受这种教育制度浸染,久而久之积淀下来,在香港社会就塑造出英语和西方价值观高于一切的被殖民心态,它就像空气一样,呼之不觉、吸之不觉。目前,香港90%的学生选择英语学校,只有10%的学生选择中文学校就是最好证明。同样,在这种文化浸染下,有些中小学教师以英语教育背景者居多,他们崇拜英语文化和西方价值观,贬低中华文化,缺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有些香港人甚至以做中国人为耻。尤其是香港个别教师专业团体,热衷“去中国化教育”,长期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建制派搞对抗,在“修例风波”中,有些教师甚至煽暴、纵暴,毒害学生。可以说,个别教师专业团体是“重英轻中”的堡垒,殖民影响下的文化惯性根深蒂固。

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制度惯性”,导致香港学生难以对中国文化和内地形成文化血缘上的亲和力。长久以来,港英当局对香港教育实行放任自流政策,对教会、团体、私人办学缺乏整体性、长远性考虑,形成了全世界罕见的以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基础教育体制。据香港

教育局2019年统计,香港普通中小学(包括本地和国际)共1093所,其中官立中小学(由政府开办,教育局管理,教职员均为公务员)只有65所,仅占学校总数的6%,其余94%为非官立学校,包括资助学校、直接资助计划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等。这些非官立学校的共同特点是不由教育局管理,而是由法团校董会或校董会管理,其举办者背景复杂,涉及教会、团体和私人,而很大一部分是教会学校。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香港基础教育体制,导致校长任命、教师聘任、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缺乏政府的统筹规划,学校相互间各自为政,基本上是“一校一策”。受这种制度惯性影响,香港的非官立学校常以保护办学自主权为幌子,抗拒特区政府对学校的教育治理和必要行政干预。因此,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基本法教育在这些学校长期遭到抵制,甚至有教师将错误、歪曲的信息灌输给学生,导致香港部分年轻人很难对中国文化和内地形成文化血缘上的亲和力与归属感。其结果是,有些香港年轻人心中难有国家和民族认同。

港英当局变“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的“政策惯性”,削弱了特区政府的教育管治权。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实行港督主导的集权统治,是一个典型的“行政主导”体制。但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港英当局为维护其在香港的既得利益,未代总督彭定康不顾《中英联合声明》的约束,单方面搞政改,把香港原来的“行政主导”体制扭转为“立法主导”体制。这给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管治权,造成了沉重障碍,压缩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干预空间,大大削弱了行政长官的教育管治权,造成教育话语权缺失。加之英国撤出香港后,留下的势力真空很快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填补,外部势力不时干预香港教育。于是,在一小撮人的操控下,纯粹的教育问题就容易被渲染上升为政治问题。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发布《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引发“反国教”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理论广角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振兴发展的最根本的事业。香港回归以来陆续出现了系列风波,尤其是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相当多青少年学生参与其中,部分教师煽暴、纵暴,凸显了香港教育的积弊,引发社会严重关切。笔者认为,香港教育的积弊,关键症结是教育去殖民化不力。只有铲除香港教育的殖民影响,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意识和中华文化认同,才能真正提升香港教育服务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助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香港教育的殖民化影响是长期形成并固化下来的,因此,教育去殖民化工作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这一过程是长期、复杂的,而且带有“一国两制”下的特殊性,必须着眼长远,统筹全局,维护国家安全。

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使殖民主义影响已渗透到香港的方方面面,这使得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具有长期性。可以想见,经受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教育后,很大一部分香港人已认同乃至崇拜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并贬低中华文化。这种心理认同的扭转不是短时期内能达到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香港回归后,受英、美新殖民主义等多种因素影响,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具有复杂性。回归前,香港主要受英国的殖民影响,回归后则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种势力的影响。多国纷纷

在香港设立超常规规模的驻港领事馆,并在香港实施“颜色革命”为主要目的。英美新殖民主义以香港教育界为重要对象,对香港师生、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进行渗透,重点扶持香港部分高校青年师生组织游行、示威、罢课等政治活动。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惯用伎俩,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具有高度特殊性。根据香港基本法,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方面的高度自治权。理论上讲,教育事权掌握在香港特区政府手上,但由于上述的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基础教育体制的制度惯性和“组织惰性”,使香港回归24年来,教育去殖民化未见明显成效。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实施教育去殖民化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绝无仅有的,必须高度重视其特殊性,积极探索,久久为功,绵绵用力。

如何推动香港教育去殖民化

香港教育去殖民化涉及面广,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思维。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以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意识、民族认同、实现香港人心回归为目标,用“教育去殖民化”改革思路统揽目前已实施的香港其他教育改革措施,使香港教育去殖民化保持连续性并向纵深推进。

一是香港教育事关国家安全,必须提高其战略地位的认识。深受英国殖民主义和英美新殖民主义影响,香港教育面临各种政治力量和各色社会组织的包围,尤其是敌对势力把香港作为对内实施“颜色革命”的示范区,处心积虑实施意识形态渗透,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必须提高对香港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对香港教育方针、人才培养目标、爱国主义教育等方向性内容作出基本规定,在相关立法中将教育事务从科技、文化、卫生等其他事务中分立出来,凸显教育的重要地位。

法律要求,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办学实践,同时完善相配套的香港国家教育监督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三是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平台作用,加强交流,增进了解。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领域合作发展,重点实施“姊妹学校”工程,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姊妹学校”交流制度,并制定相关激励措施,进一步在合作发展和交流互动过程中增进香港师生对内地地了解,增强国家意识和中华文化认同。同时,加强与香港教育相关部门的战略合作,在课题研究、教材编写、音像制品制作等方面加强合作。鼓励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完善香港同胞在内地报考教师资格证的相关配套工作。

二是切实落实香港国安法相关内容,为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奠定法制基础。香港国安法第九、十条是对香港基本法关于教育条款的全新拓展,是中央对香港应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提出的法律要求,是中央获得香港教育部分事权的法律依据,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性。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及其他境外乱港势力受到震慑,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为学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彰显了教育的严肃性。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区政府陆续发布了针对学校等机构的国家安全实施指南。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落实这些

四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工程,提升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香港毗邻广东,与广东在文化、语言、心理、风俗、禀赋各方面最为接近,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属于岭南文化范畴。要推动香港学生与内地学生交往交流,提升香港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提升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挖掘广东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内涵,加快打造一批国际化、高品质、重实践的标志性研学产品,建设一批优秀研学旅行教育基地,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学生互动交流,促进心灵相通,助力香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社会融合研究中心)

“培养小马云”原是一桩租赁儿童的生意?

12岁的范小勤在外做了3年多时间的“小马云”之后,由“保姆”王云辉送回江西省永丰县石马镇平辉村。一衣服、一个书包是他在外几年的全部“家当”。这次回到村里,他不会再回河北石家庄了。2月19日,范小勤的父亲范家发告诉记者,范小勤将回村里的学校继续读4年级,之前接范小勤去河北读书的“老板”刘长江在今年元旦前赶到石马镇,和他一起办理了转学手续,并且和范家发“解除合约”。(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范小勤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这让范家发发出了当初的期待落空。当然,范小勤回村后依然会继续读书,当初的签约人刘长江承诺负担学费;然而,按照原范家发支书的说法,义务教育不花钱,还补贴。读小学一年补贴500元——没有多少、甚至不存在“学费”的问题。所谓“将继续承担读书的费用”的承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而回过头来看范小勤离家在外这几年的情况,究竟是“爱心老板”带他出去读书、好好培养,还是被“租赁”当成赚钱工具,最终失去价值后被解除“租赁合同”?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此事不仅是一家企业与网红未成年家长之间的“合同关系”,还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等一系列问题。

据范家发描述,范小勤被带到河北后,他每年都会收到老板打来的“万八千块钱的生活费”;可按理说,若是爱心培养,对方只要管好范小勤的生活和读书问题就够了,无需一边培养孩子,一边资助孩子家庭。当然了,如果爱心人士愿意,如何资助都是人家的权利,但夹带着讨价还价的“资助”,味道就不对了吧?据范家发讲,若父亲不去探望孩子,每年多给2000元——这是地地道道的交易吗?

而范小勤“在外读书”期间“在社交平台的直播很热闹——参加电视节目、时装走秀……生日4月30日的他过生日时间被定在5月20日,长条餐桌坐满了大人,视频配字‘阿里巴巴太子爷的生日晚会’……”这究竟是爱心人士在“培养孩子”,还是在利用网红直播带货为企业经济利益

服务?

关于范小勤以“小马云”形象在网上参加直播带货,甚至因此辍学的消息,网上时有曝出,且有图有真相。而在学校向媒体出具的一份说明显示,范小勤从2019年12月18日起,“就隔三五差五请假,没参加期末考试”。2020年,他有近两个学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这哪是去读书?

而“爱心老板”当初所说的“如果他读书好,考大学,如果没有考上,就安排进公司做事”的承诺,现在完全泡汤了。很多网友质疑,“小马云回乡”其实是其热度逐渐递减后最终失去利用价值,而被“爱心老板”抛弃。

或许该说,今天的结局不出意料,但是,以“培养”之名行“租赁消费”之实这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经营行为,是否涉嫌违法、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特别是如何避免此类“消费未成年人”的谋利行为再次发生?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据报道,范小勤患有智障。那孩子更应受到社会保护,而不任由他人摆布。

《未成年人保护法》六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就此事来说,让一个智障儿童按照大人的要求,每天对着镜头重复“大家好,我是小马云,我爱你们……”,这是否有违孩子的天性?是否危害智障儿童身心健康?并不难判断。

第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遗憾的是,“消费小马云”似乎从未受到任何干预。

范小勤在外过了几年“有人管”“有保姆”、吃得好好住得好穿得好的生活之后,又回到了“泥坑里打滚”的生活状态,这种落差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可能不是蹭网红热度的“爱心老板”所关心的;但网络直播带货越来越“低龄化”,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成为大人甚至企业赚钱工具的背景,相关监管和立法都应跟上来才对。

全程“带电”监督让骗保无处遁形

首席评论

2月19日,《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全文公布,共五章50条。《条例》明确了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相关主体的职责,规范了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明确要求医保基金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特别是对于骗保行为,设定了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2月21日《新京报》)

近几年,我国打击骗保行为力度持续加大。2018年9月,国家医保局联合卫生健康委、公安部、药监局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2019年全国医疗保障部门共检查了定点医药机构81.5万家,处理违法违规违约的医药机构26.4万家,占被检查机构的32%。当年追回医保基金115.6亿元。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139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82名,追缴医保基金4亿多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专项行动查获的大案要案很多,但骗保案多发态势仍没有得到扭转。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因为专项行动具有时效性,行动期间的力度再大,过后也有歇歇脚的时候,此时骗保行为容易旧态复萌。这说明,运动式治理不是长久之策,将治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方能确保治理规范化、常态化。

另一个原因是,骗保环节多、链条长,参与者较多,但不是每个环节和每个参与者,都能得到有效监督和处罚。比如,患者配合医院骗保,在医院里挂

病床、做假手术、虚开药品等,不仅不掏钱,而且还管吃管住、拿红包。即使事发被查,骗保的是医院,与患者无关,这样一来,部分患者不仅起不到监督医疗行为的作用,反而会做医院骗保的帮凶,既增加了骗保频次,又加大了查处难度。

让每个环节都进入监督视野,让每天都是“专项治理日”,就得建立严密细致的监督体系,并以法规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用有法可依填补监督漏洞,用有法必依来减少监督的随意性,用执法必严来提升全程监督的震慑力。正因如此,该《条例》对医保行政部门、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以及参保人等主体的职责进行了清晰界定,为每个环节、每个主体都出台了相应的监督条款。

《条例》的实施,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尤其深远。当医保行政机构和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不作为或慢作为时,除了要根据岗位职责和纪律进行惩戒外,以后还要根据《条例》进行依法处罚。参保者倒卖药品、用医保卡购买生活用品,或将医保卡借给他人使用,在过去很难得到惩罚,但《条例》规定,个人骗保与定点医药机构一样,处罚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个人骗保也会摊上事儿,依法使用医保卡方能成为参保者的普遍遵循。

监督不仅有法可依,而且不遗漏每个环节,不放过每个参与骗保者,如此闭环相扣并全程“带电”,医保监督将开启法治化的新时代,此后,只要《条例》能够得到彻底贯彻落实,骗保行为将无处遁形,不再有侥幸逃避监督与处罚的机会。

茶颜悦色的广告何以“翻车”?

热点快评

孙梓青

知名奶茶品牌“茶颜悦色”在马克杯上的一句广告词,被网友指责“歧视女性”。为此,茶颜悦色连续两天在官方微博上道歉。

茶颜悦色是目前最风靡的奶茶品牌之一,已然成为长沙网红文化的名片。为喝上奶茶排队几个小时已是常事,甚至不少外地游客去长沙,就是为了茶颜悦色的一杯奶茶。据报道,去年茶颜悦色在武汉新店开业当天,排队时长一度达到8个小时,足够乘高铁从武汉往返长沙。

然而,这次茶颜悦色广告包装的创意伤了部分粉丝的心,不少网友都对茶颜悦色表示失望。考虑到茶颜悦色的消费群体(以女性为主)及其本身的“网红”属性,这次风波恐怕会对茶颜悦色的品牌形象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无独有偶,不久前全棉时代的一则广告同样因为涉及性别问题被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按道理,这些企业的营销广告不会去有意冒犯女性(它们的目标客户),但是为什么这样有争议的广告却反复出现,又反复刺激着公众的敏感点?

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些广告以流量



20日,一则贵州省都匀市某足球场被用于赶集而遭到损坏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对此,都匀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在20日晚回应称,为满足春节期间群众赶集需要,因此将此区域有限制地临时作为赶集区域,目前该足球场破损的人工草坪已修缮完毕,并明确不再将该区域作为赶集区域。(2月21日中新网)

据都匀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称,为缓解疫情期间农贸市场人员密集压力,满足春节期间群众赶集需要,才将足球场临时用作赶集区域。此举也得到了不少人的点赞,甚至被当成利民惠民的“生动样本”。

简单来说,修建足球场是为了改善民生,是促进群众体育发展,而足球场临时用作赶集区域,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为了便民惠民。但专业足球场的养护成本高,足球场临时用作赶集区域,会对草坪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由此带来的损失不能忽略不计。而且将群众体育设施挪作他用,有人踢球怎么办?为了满足群众赶集的需求,却罔顾群众体育锻炼的需求,这样的做法难言合情合理。

相关部门要满足群众赶集等民生需求,应尽量避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避免由此带来的“副作用”。

推进“民生工程”,要考虑周全、科学决策,才能更好地利民惠民。专业足球场被临时用于赶集,虽是为了民生,但仍有欠妥之处,还不能算是利民惠民的“生动样本”。